

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苏：帕·索·梅拉赫著 戚仲伦 张耳 李英男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列宁和俄国文学问题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¹/₄印张 2插页 339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98 定价: 1.65元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编辑说明

本丛刊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辑出版，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目 录

引言.....	(1)
列宁和文学中的民粹主义.....	(31)
列宁和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	
革命时期的文化与文学问题.....	(115)
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时期的文学与美学问题和	
列宁同哲学上反动势力的斗争.....	(193)
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	
(撰写经过和有关问题)	(307)
列宁和十月革命后最初年代古典艺术	
遗产的命运 (1917—1919)	(422)
译后记.....	(448)

引言

一九〇二年列宁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俄国的历史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的一年要超过和平时期的十年，人们在给改革后的半个世纪做总结，在为那些将长久地决定全国命运的社会政治大厦奠立基石”（第6卷161页）^①。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头十年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是各社会政治派别以及各文学流派之间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斗争，科学及艺术各领域中爆发了尖锐的论争的时期，也是“重新评价一切”的时期。

列宁在论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一句话：“现在我们这儿，一切都翻了个个儿，一切都在刚刚开始安排。”类似的话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各种不同派别的报章杂志上随处可见，只是说法不同罢了。甚至象《基础》这样的杂志，虽然其刊名给人以沉静、“不动”的印象，也承认“人心纷扰”、“一切都在旋转、一切都在骚乱的旋风中奔突”，这就使文学界显得“格外不平静”^②。格列勃·乌斯宾斯基谈到由于出现了生活的“新阶段”，因而产生了“全新的现象，正个机体严重失调的现象”^③。柯罗连科在他的特写中写道：“村社里到处出现纠纷和对立”^④。在九十年代曾引起激烈争论的

① 本书中所有援引列宁的话，均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版（个别词句根据新译文稿作了修订或由译者稍作改动）。凡遇《列宁全集》中的引文，仅标明卷数和页数，不再重复《列宁全集》中文版等字样。——译者注。

② 《基础》1882年第1期第77，79页。

③ 《俄国思想》1882年第1辑第228页。

④ 柯罗连科：《荒年》，圣彼得堡，1894年，第28页。

魏烈萨耶夫的小说《风气》中，有一位女主人公说：“我们周围的生活正发生多年未见的、根本的变革，一些事物在倒垮、在灭亡，而另一些事物则在悄悄地生长”。这种变革不但锤炼出了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战士，也引起那些“在倒垮、在灭亡”的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苦闷和注定要灭亡的预感。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一八九三年写道：“我们正生活在犹如解冻一样的奇异时期……，一切都在融化……，水面上复盖着一层一踩即破的薄冰，令人望而却步”^①。旧俄国确实如履薄冰。十九世纪末叶进步的小说和诗歌，描写大河解冻、奔腾而下的景象颇为流行。它象征新俄国在前进，人民大众在前进。这浩浩荡荡的前进运动范围日趋广大、气势愈加磅礴。后来，列宁自豪地称之为“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第16卷第352页）。

“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荡涤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时的理论之争正是尖锐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和各政治派别的斗争。革命不可避免地将要来临——这已不仅是经过科学分析而得出的论断，当时一些最敏感的人、甚至远离直接革命斗争的人也已意识到了^②。在革命即将来临的形势下，整个俄国的进步社会思想史和俄国文化史被视为争取人民真正彻底解放的一个准备过程。曾使历代俄国进步人士反复求索的“怎么办”的问题，已变成具体的实际行动问题。尽管那些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陈词滥调尚在蔓延，以《莫斯科新闻》为喉舌的反动派仍在顽固不化地叫嚷什么人民是“忠于君主制、东正教和民族性”的，尼古拉二世也操着文牍式的官腔喋喋不休地叫嚷什么“大俄罗斯帝国的基础坚固不拔”。但是一个新的、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力量——无产

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论现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和新的文学流派》，圣彼得堡，1893年，第73页。

② 参看本书第129—130页关于契诃夫的预感的论述和本书第371—373页关于托尔斯泰的预感的论述。

阶级已登上了历史舞台，从而使整个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分化也大大加剧了。俄国文学的伟大作用再一次突出地显示出来。

在俄国，数十年来、社会的主动精神在文学领域中表现得最为自由。俄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使得俄国的进步作家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思想代表，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及的。赫尔岑写道：“没有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便是他们唯一的论坛。只有从这个论坛上，他们才能使人们听到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①。普希金谈到在祖国最艰难困苦的时代，作家“披坚执锐，站在启蒙运动的前列”，表现出英雄主义精神时，也补充说道：

“他们不应因为自己永远首当其冲，身受一切苦难和风险而胆怯退缩、怨天尤人”^②。这种英雄主义精神象一条红线贯穿于“热烈渴望解决社会生活任务”^③的俄国进步文学的整个历史。正因为如此，俄国文学才有这样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样深刻的哲学含义，并将艺术创作与政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十九世纪末，两个世纪的交界线上，文学已不再是“唯一的论坛”了。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胜利、无产阶级秘密刊物的发展——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赫尔岑当时曾指出过的文学的那种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进步文学仍然是认识生活，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有力手段。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把俄国文化的传统及其未来的问题同面临要改造世界的那个阶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

列宁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强调指出：“只有以先

① 《赫尔岑著作及书信全集》，列姆凯主编，彼得格勒，1919年，第6卷第305页。

② 《普希金全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11卷，第163页。

③ 高尔基：《1905—1916年论文集》第二版，彼得格勒，1918年，第86页。

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那些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第5卷第337页）。

一八八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①。这是因为俄国文学同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哲学思潮，同俄国国内掀起的革命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想到俄国所有的优秀作家努力进行的思想探索，想到俄国的文学，文学评论和政论文，既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新思想，又批判地检验了别国的理论思想，我们就能够充分领会到列宁关于十九世纪末俄国文学所具有的意义的那句话的含义。在此还应该提到成熟时期的别林斯基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动和庸俗方面的批判，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反动唯心主义学说的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革命运动只有掌握了在科学上无可辩驳的正确理论之后，才能取得彻底胜利。由于书刊检查的限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思想是用隐晦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对于他的读者来说，其含义是十分清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当现在立志改造西欧生活的那些代表人物牢牢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之时，就是新原则在西欧社会生活中即将胜利之日”^②。

十九世纪末，这个时期在俄国终于来到了。当列宁谈到：“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时，他提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以说明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十卷集》，圣彼得堡，1906年，第6卷第206页。

时期俄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列宁写道：“在上一世纪四十——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人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第31卷第7页）。这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行者已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俄国扎根和发展准备好了土壤。就这个角度来说，有几件事具有典型意义：即早在俄国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出现之前，别林斯基已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从历史角度来看内容正确的批判，并且捍卫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运动的思想；还有，“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第8卷第11页）；此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力求批判地吸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最伟大的代表们的学说（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是这一学说的继续，参看第19卷第1—8页），但是由于当时俄国生活的落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未能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水平。

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和政论文对俄国十九世纪进步民主思潮的总的思想发展所起的突出作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十九世纪俄

国进步的文学、文学评论和政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仍有其现实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反映了俄国生活的最重要矛盾，而且多数一直未能解决，直到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当列宁分析他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情况时，他经常回顾俄国文学和政论文的历史，研究有关传统的问题。弄清某一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常常有助于他更加明确地判定这一现象的社会内容。

列宁对俄国文学评价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所特有的洞察力。列宁善于以简洁的，有时非常言简意赅的形式，一语道破作家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并指出他在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总过程中的地位。

同时，这些评价又成为对那些极其复杂的过程（例如：分清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学运动中的基本路线和阵营，这些阵营间的相互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特点等）进行原则性概括的根据。譬如，列宁提出这样的观点：“六十年代的自由派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这两种倾向和力量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都在决定着为建立新俄国而进行的斗争的结局”（第17卷第104页）。又如列宁提出这样的论点：“一八六一年诞生了一九〇五年”（第17卷第107页）。此外列宁还提出俄国文化发展史上两条基本路线斗争的理论——一条是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路线，另一条则是由《莫斯科新闻》、《俄罗斯通报》、立宪民主党人的政论文学及《路标》的思想体系为代表的剥削阶级的“文化”路线。

列宁一方面对俄国古典作家——从拉季谢夫到高尔基作了评价，另一方面，又对反动的美文学、反虚无主义的小说，对卡特科夫和苏沃林之流的政论家，对“路标”派的立场以及对象萨温科夫的小说等的反动时期的叛徒文学进行了批判。这些评价和批判系统地反映了列宁对俄国文学史的观点。列宁对过去的文化进

行评价时，总是把它与当代的迫切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对传统问题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仇视革命人民的根源追溯到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生活中两条基本路线的斗争和进步文化同反动文化的斗争。他指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果戈理笔下的典型神父、录事和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农奴制度也是‘恋恋’不舍的”（第26卷第382页）。

列宁关于俄国文学人民性问题的提法也同样表现了他那高瞻远瞩和洞察力。

在列宁看来，真正人民性的本质，就在于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人民性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就是说，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同人民本身的发展，即人民的觉醒过程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列宁十分注意研究人民觉醒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列宁所说的俄国还处于“麻木不仁，停滞不前”的时期，到“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期，文学起初是唤起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然后又同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融合在一起。于是这些清晰的线条便勾画出一幅包括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和多种多样的社会动力在内的俄国文学运动的画面。

列宁从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俄国文学和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看作是由客观规律性所支配的发展过程。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一切意识形态形式，包括文艺形式的更替，都来自物质生活的矛盾这一论点，他表明以此来说明其中的任何形式都可以成为真正科学的说明，这里的关键在于要把社会发展过程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要研究各种社会结构及其客观规律、内在矛盾、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和社会变化的客观逻辑。这就需要把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看作是一种活跃的、处在经

常运动状态的社会机体（参看第1卷第388，389页）。诸如“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机体”这些范畴在方法论上是极其重要的。前一个范畴要求我们去揭示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这是研究社会生活任何一个领域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研究的科学性，消除主观主义和事先拟就的公式。第二个范畴要求我们把社会看作一种极为复杂的结构。在这方面，列宁对各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具体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在列宁看来，“社会机体”就是相互作用、相互抗衡、处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发展中的一种结构。这种机体既包括泾渭分明的几个主要阶级，也包括具有形形色色的观点和情绪的各个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在研究俄国文学的时候，这些集团和阶层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列宁著作中对城市贫民、小市民、流氓无产阶级、商人、手工业者、宗教界和官吏等阶层都作出了精确的非常中肯的评价，这些评价对文学史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阶层联合在一起，绘出了一幅“社会机体”的异常复杂的图画。而这幅图画在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描绘。而文学作品中反映社会结构的全面性一向吸引着列宁的注意^①。

这一分析的诸方法论原则中，列宁对社会形态的说明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工作者的任务，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把某一种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表达出来，把它的生活习惯、阶级对抗、以及它所特有的上层建筑、思想意识以及家庭关系等等都和盘托出（参看第1卷第121页）。用列宁的话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够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第1卷第122页）。

① 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谈到，列宁对高尔基一向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高尔基广泛描写了俄国社会及其各个社会阶层，尤其是工人、城市贫民和所谓“底层”人民的状况。（参看《列宁和高尔基书信、回忆录及文献集》，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61年，第321页）。

“社会机体”在“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许多不同因素，其中也包括社会情绪和社会情感，也就是文学作品中必然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的表现。离开了这些社会心理现象，就不可能逼真地描绘社会形态。

列宁不止一次地谈到社会情绪的作用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谈到社会情绪同社会斗争和革命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社会情绪有时是模糊的、自发的，有时则是自觉的）；谈到群众情绪的摇摆不定及其矛盾状态，即种种自相矛盾的情感交织为一体的状态；谈到人民的情绪在一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到了某一阶段，便可转变为认清形势，了解斗争的目的和任务；谈到各种思想影响对情绪和情感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列宁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第31卷第77页）。

在列宁的著作中多次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农民、资产阶级和贵族——以及知识分子和不同的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情绪，也描写了“时代情绪”^①。列宁谈到这一社会心理因素的巨大意义时指出，在深刻的政治危机的条件下，“最微小的、离开真正的革命策源地似乎最遥远的冲突都可能具有最严重的意义，都可能成为导火线，成为增加一滴就使水漫出杯外的那一滴，成为情绪大转变的开端等等”（第15卷第251页；着重号是引用者标出的）。当革命斗争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下发展到最高阶段

① 关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请参看帕雷金的《社会心理学》一书，莫斯科，1966年。

的时候，人民的情绪便会转变为人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在另外一些历史时刻，人民的感受和情绪，尚未形成思想上自觉的观点或者这些观点同对事情实质的不正确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如，列宁在一九一五年称辛克莱为“有感情的社会主义者”，并且引用了辛克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中的一段话，其中写道：“……进化产生在人们心中；我们是进化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进行斗争，就不会有任何进化……一千个满怀信心和决心的人，要比一百万个谨小慎微的和可敬的（可尊重的）人强得多”。列宁指出辛克莱当时所站的立场是进步的，指出他的号召“基本上极为正确”（第21卷第241—242页）。但又强调说，“感情”是不能代替对历史过程的理性认识的。由此可见，文学上所反映的情感和情绪是研究某一时代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根据以上这些方法论原则，既能够研究某一历史时代所具有的特点，又能够研究某些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的规律性。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首次找到了“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的客观标准。他们“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第1卷第120页）而已。然而“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②，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

① 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看本文作者所著《列宁的历史方法论若干问题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研究》，——《列宁的遗产和文艺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69年

② 此处本有列宁对“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一段说明，原作者把它略去了。以后凡引文中的这类情况，均系原作如此，不再说明。——译者注。

家所共有的东西”（第1卷第120页）。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社会形态这一范畴应用于社会学，制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并确立了“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第1卷第389页）。

列宁以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复律标准”为依据，论证了各种意识形态现象发展中的共同点和与众不同的特点（如列宁论述了各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共性和特殊性），列宁的这些论点对文学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列宁认为，民粹派不善于发现普遍的历史规律，看不出不同的国家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也看不出它们中间的每一国家所具有的特点，这是民粹派对历史发展过程一窍不通的突出表现。

在本书中我们将努力说明列宁在分析托尔斯泰的矛盾时，是如何应用“重复律标准”的。众所周知，西方的伪学者和早先的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胡说什么托尔斯泰观点的弱的一面，即他的“不抵抗”论，正是俄国农民内在的固有的特点。列宁指出，早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间的革命时期，俄国农民就掀起了农民起义史上规模空前的浩浩荡荡的革命运动，可见托尔斯泰的“勿用暴力抗恶”论只是一定历史经济条件的反映，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生活的产物。运用“重复律标准”来进一步说明列宁的上述论点，便可发现东西半球的各国文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都出现过与托尔斯泰思想弱的一面相类似的观点。与此同时，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作品的强的一面，正是反映了全体俄国人民无比强烈的革命的反抗精神。托尔斯泰深刻地批判了社会的不公平，并且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能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

同“科学的重复律标准”完全相反的是比较主义的方法论。比较主义的方法论把文学发展看作是“超民族”的统一的潮流，

无视俄国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以及文艺创作的具体历史内容。苏联许多文艺学家的著作中都谈到，文学发展的某一历史规律性总是根据某一国家的特点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当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许多国家都出现过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某一国的作家受到了另一国作家的“影响”，而是由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每个国家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浪漫主义，都因为它有与他国文学相同的某些特征。但是每个国家的“浪漫主义”又反映该国的一定阶级和该国的民族文化所固有的一些特征。现实主义当然也不例外。只有从马列主义理论出发，才能对各国民族文学的特点以及各国文学互相丰富的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

* * *

列宁说明任何问题、包括文学问题时所遵循的总的方法论原则中，有两个原则对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重要：第一个原则是关于研究选择和安排事实材料；第二个原则是关于研究这些材料的基本方法。

根据列宁的提法，这些总的方法论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准确无误地掌握全部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列宁指出，在研究社会现象方面，为了证明事先拟就的公式，人为地去选择和拼凑事实并为了同一目的而去选择例证，没有比这更流行和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列宁说：“……必须毫无疑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第23卷第279—280页）。

另一个方法论原则是关于研究方法。这一原则告诉我们，马

克思主义的全部精髓、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原理只是历史地，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参看第35卷第238页）。

以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列宁在说明文学现象时的出发点。这两个原则在列宁论赫尔岑和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得到了详尽无遗的发挥。列宁一方面一丝不苟地考虑到各方面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坚持深刻的党性立场，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说明这些事实。正因为这样，列宁对文学的论述才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列宁论赫尔岑的文章是这方面的典范。我们分析一下这篇文章的事实根据和列宁所利用的材料来源便可发现列宁极其仔细地研究了各个方面的大量材料。我们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列宁不仅对赫尔岑的著作、生平及其思想演变了如指掌，而且还研究了伦敦俄国自由印刷所的出版物，他不仅翻阅了报刊材料，也翻阅了已经发表的赫尔岑同代人的私人通信，以掌握当时不同派别围绕赫尔岑所进行的社会文学斗争。列宁为了进行论战，利用了有关赫尔岑的文学评论和报刊上为纪念赫尔岑诞辰一百周年所发表的文章。另一方面，列宁又把赫尔岑一生的活动看作是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直到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为止的整个俄国社会政治解放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列宁遵照这一方法，在文章中提出了有关俄国解放运动分为三大发展阶段的开创性的新观点。这个观点后来就成为我们了解历史过程和划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发展阶段的基础。

列宁要求“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出个别的事实”，列宁对赫尔岑进行全面评价时，正是按照这一要求去做的。列宁在承认赫尔岑的伟大作用和功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严厉指出赫尔岑的弱点和错误，例如